

易读

2013年第4期

本期关注
西南联大

东莞图书馆
DONGGUAN LIBRARY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城乡中国》：不断划界中的城乡中国

《列那狐》

有一种阅读叫“粉丝阅读”

论情爱

墨海书馆的兴衰历史

童心童阅故事会

“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易读

2013年第4期

2013年第4期(总第11期)



主办：东莞图书馆

指导：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与社会阅读委员会

主编：李东来

副主编：冯玲

编辑：李正祥 杨河源 黄文韬

唐燕 张宽路 麦志杰

美编：简音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中心广场内

邮编：523071

邮箱：yidu@dglb.cn

电话：0769-22834154

刊期：季

开本：大32开

印数：2500册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

准印证号：莞准印字第DG2013-135号

印刷单位：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本出版物部分文章来源于图书、报刊和网络，旨在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推荐好书、好文，促进全民阅读。所选文章经著作权人同意刊登，其中个别作者因地址不详，暂时无法取得联系。请原作者见出版物后与编辑部联系。



卷首语

冯玲

前不久，全民阅读被国务院法制办列入立法计划，消息传出，竟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作为以服务阅读为业者，我理解这立法的背后，充满对阅读危机的担忧：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未成年人阅读的现状不容乐观、阅读风气式微、阅读功利化和娱乐化让国人“阅读力”下降等等。

阅读的意义在于求知交流和精神享受，阅读的动力在于好奇和兴趣。社会阅读氛围的形成，如一位专家所言，离不开四要素：美好的创作者与书写者，懂得并拥有诗意栖居的性灵，以读书为荣、为乐、为资本的社会游戏规则，自上而下将阅读视为时尚的取向。立法正是建立美好规则和价值取向的方式和手段，但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精神追求的改变，养成懂得并拥有诗意栖居的性灵，还需要社会更多的呵护和个人持续的自觉努力。

在筹备本期关注“西南联大”时，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联大图书馆的资料，知道了联大图书馆是校园中唯一一座砖房瓦顶的建筑，在泥屋草顶的联大格外触目，也间接感动于联大的创办者、领导者对图书馆这一学术中枢的高度重视。联大学生都很勤奋，每天图书馆门还没开，就排起长队。由于馆藏有限，学生每次只能索书一册，四小时为限，图书使用率相当高。《西南联大的“印”和“证”》一文记录了一张“教职员借书证”，证主人是出纳组一名助理。自1943年3月8日至1943年5月28日，这位普通职员在人事去留相对动荡、个人心态最易浮躁的年头，两个多月共借书22本，每周两本，联大人读书之勤快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对不少人数载甚至十数载可以不读一本书，时下大学要设立阅读奖做激励，不知该说什么了。

当然，对于阅读这件事，真正的激励，再多也不为过。



叶昊旻 绘

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
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

—— 培根

目 录

■ 卷首语

■ 本期关注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 谢 咏 / 4

那段岁月，已成绝响 / 刘宜庆 / 10

思想与文学维度中的西南联大 / 李玮炜 / 14

西南联大之书小辑 / 东 图 / 17

■ 阅读前沿

《城乡中国》：不断划界中的城乡中国 / 左 思 / 24

《反叛的科学家》：科学家中的“老狐狸” / 思 郁 / 28

《不平等的代价》：美国为什么变得更不平等？ / 郑渝川 / 31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追寻思想者的最后踪迹 / 刘绪源 / 34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忧伤的尊贵 / 章果果 / 36

新书扫描 / 张宽路 李正祥 / 39

■ 人间书话

《列那狐》 / 钟叔河 / 45

围城里的笑声 / 叶兆言 / 47

一次法律保护下的环球旅行 / 孟庆德 / 50

董桥：闲中着色 / 刘绍铭 / 53

爱伦·坡的小说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56



■ 阅读阅读

有一种阅读叫“粉丝阅读” / 张涛甫 / 58

翻译作品的阅读 / (日)大江健三郎 / 61

■ 原汁原作

论情爱 / 宣永光 / 64

争先恐后 / 于坚 / 68

关于写信的记忆碎片 / 张立宪 / 71

风雨时代的钞票 / 张五常 / 75

谈嫉妒 / (英)培根 / 79

■ e读

搜索谁更懂你的心 / CFan软件研究室 / 84

电子书成本论 / (美)约翰·达沃夏客 / 88

■ 出版回望

墨海书馆的兴衰历史 / 黄信初 肖蓉 肖丽 / 90

墨海书馆与西学传播 / 李斌 / 94

■ 书香社会

案例：童心童阅故事会 / 童心童阅 / 98

读吧！新加坡 / (新加坡)阮阳 谢耀文 / 101

书香短讯 / 张宽路 李正祥 / 105

■ 易读社区

“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 吴晞 / 109

共享书香 / 雨兰 / 111

俞平伯与《浮生六记》 / 毛本栋 / 113

那人会回来吗 / 钟立红 / 115

卷首语

冯玲

前不久，全民阅读被国务院法制办列入立法计划，消息传出，竟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作为以服务阅读为业者，我理解这立法的背后，充满对阅读危机的担忧：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未成年人阅读的现状不容乐观、阅读风气式微、阅读功利化和娱乐化让国人“阅读力”下降等等。

阅读的意义在于求知交流和精神享受，阅读的动力在于好奇和兴趣。社会阅读氛围的形成，如一位专家所言，离不开四要素：美好的创作者与书写者，懂得并拥有诗意栖居的性灵，以读书为荣、为乐、为资本的社会游戏规则，自上而下将阅读视为时尚的取向。立法正是建立美好规则和价值取向的方式和手段，但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精神追求的改变，养成懂得并拥有诗意栖居的性灵，还需要社会更多的呵护和个人持续的自觉努力。

在筹备本期关注“西南联大”时，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联大图书馆的资料，知道了联大图书馆是校园中唯一一座砖房瓦顶的建筑，在泥屋草顶的联大格外触目，也间接感动于联大的创办者、领导者对图书馆这一学术中枢的高度重视。联大学生都很勤奋，每天图书馆门还没开，就排起长队。由于馆藏有限，学生每次只能索书一册，四小时为限，图书使用率相当高。《西南联大的“印”和“证”》一文记录了一张“教职员借书证”，证主人是出纳组一名助理。自1943年3月8日至1943年5月28日，这位普通职员在人事去留相对动荡、个人心态最易浮躁的年头，两个多月共借书22本，每周两本，联大人读书之勤快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对不少人数载甚至十数载可以不读一本书，时下大学要设立阅读奖做激励，不知该说什么了。

当然，对于阅读这件事，真正的激励，再多也不为过。

目 录

■ 卷首语

■ 本期关注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 谢 咏 / 4

那段岁月，已成绝响 / 刘宜庆 / 10

思想与文学维度中的西南联大 / 李玮炜 / 14

西南联大之书小辑 / 东 图 / 17

■ 阅读前沿

《城乡中国》：不断划界中的城乡中国 / 左 思 / 24

《反叛的科学家》：科学家中的“老狐狸” / 思 郁 / 28

《不平等的代价》：美国为什么变得更不平等？ / 郑渝川 / 31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追寻思想者的最后踪迹 / 刘绪源 / 34

《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忧伤的尊贵 / 章果果 / 36

新书扫描 / 张宽路 李正祥 / 39

■ 人间书话

《列那狐》 / 钟叔河 / 45

围城里的笑声 / 叶兆言 / 47

一次法律保护下的环球旅行 / 孟庆德 / 50

董桥：闲中着色 / 刘绍铭 / 53

爱伦·坡的小说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56



■ 阅读阅读

有一种阅读叫“粉丝阅读” / 张涛甫 / 58

翻译作品的阅读 / (日) 大江健三郎 / 61

■ 原汁原作

论情爱 / 宣永光 / 64

争先恐后 / 于坚 / 68

关于写信的记忆碎片 / 张立宪 / 71

风雨时代的钞票 / 张五常 / 75

谈嫉妒 / (英) 培根 / 79

■ e读

搜索谁更懂你的心 / CFan软件研究室 / 84

电子书成本论 / (美) 约翰·达沃夏客 / 88

■ 出版回望

墨海书馆的兴衰历史 / 黄信初 肖蓉 肖丽 / 90

墨海书馆与西学传播 / 李斌 / 94

■ 书香社会

案例：童心童阅故事会 / 童心童阅 / 98

读吧！新加坡 / (新加坡) 阮阳 谢耀文 / 101

书香短讯 / 张宽路 李正祥 / 105

■ 易读社区

“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 吴晞 / 109

共享书香 / 雨兰 / 111

俞平伯与《浮生六记》 / 毛本栋 / 113

那人会回来吗 / 钟立红 / 115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谢泳

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却创办出一流的大学，培养了若干大师和学术精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的光彩，犹如群星闪耀的时刻，值得我们回首瞻望。

严格说，西南联大仅存在9年时间，从1937年到1946年，是和抗战共始终的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没有校长，只有三位常委。这所大学是当时中国北方三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大学，抗战结束后就解散了。很久以来，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引起研究现代史、研究中国大学史或者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兴趣？我觉得主要是西南联大在创办过程当中的精神，它在这9年当中留下精神的遗产，对今天的大学可能会有一些启示。

从关注西南联大开始

我自己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1998年出了一本书以后，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移，就较少关注西南联大研究的情况了。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在90年代中期，整个学术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好像还没有发生强烈兴趣。我做西南联大研究，大约在1993年前后。那时我已做完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在《观察》杂志中了解到西南联大的情况。当时做这个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想从左翼文化传统以外，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感觉，这个传统保存较好的地方，应该是在大学里面。我想如果能选一个大学做研究，对梳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传统可能会比较方便。1946年

西南联大复员的时候，《观察》周刊对西南联大有一篇报道，它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宽容气质和民主精神结合的典范。这个角度正好和我试图从中国大学寻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有关系，我就开始选择西南联大来做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大家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不像今天这样基本上给予正面评价。那时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加上试图梳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对如何把这个传统从历史角度，作为思想传统发掘出来，还不是特别自觉和清晰。我最早写了一篇小文章《西南联大的启示》，希望国内的学术界能够注意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我把文章给了《读书》杂志，那时《读书》还是沈昌文时代，沈公很客气，把文章寄给在联大哲学系读过书的汪子嵩先生看，汪先生后来给沈公写过一封信，大体上说这个大学现在还值得研究。

我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时候，史料还不完善，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很少，特别是成型的史料更少。那时西南联大的校史还没有出版，云南教育社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也没有出来。当时做西南联大研究的人，主要靠清华的校史材料，还有台湾出的《学府纪闻·西南联大》。另外一本早期联大学生编的史料《联大八年》，其它就是一些零散的史料了。2000年以后，随着《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出版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完整出版，作为西南联大研究的基础，至少前期的史料工作，大体上完成。

我在90年代初期做西南联大研究，算是这个研究里面比较早的一位工作者，但那时学界对这研究兴趣并不大。我最早的论文是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1998年，我把写西南联大的文章汇成一本书，约10万字的小书，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出版社对这个书也不感兴趣，不愿意出，好在责编是文学批评家余开伟先生，他对这个书有兴趣，希望出。最后的条件是不支付稿酬，出版之后给500本书。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书印了2000册。给我

的500本书，我都没有地方送，见人就给，现在找，反而一本没有了。我想说的是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一个由沉默到关注的过程。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关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关注，可能关注的兴趣，还是从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感受中生发出来，如果这个感受不强烈，或者这个感受不能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很难走进我们现实生活里来。2000年以后，随着关于西南联大的电视片，还有相关书籍的出版，普及西南联大的工作，大体上算是完成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对西南联大的深入研究。

早期的西南联大研究，基本上在中国现代教育史领域，是研究中国大学史和中国教育史的人。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是上世纪70年代关注西南联大的，日本有学者也写过关于西南联大的书。

我是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角度切入西南联大研究的。还有一些学者如杨奎松、王奇生等，他们从政党史、学生运动史角度对西南联大做过研究，闻黎明先生，从民主同盟以及第三势力在西南联大的活动等角度，对西南联大做了深入研究。比较系统、专门的研究，现在还比较少。前几年云南师范大学建了一个西南联大研究所，但人力不是很够。它基本上还是从革命传统的角度来做研究。作为研究领域，西南联大还是有相当的丰富性。

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我们找来找去，我想还是要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这个角度来探索，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角度。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选择西方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认为一个国家光有国立大学是不

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所以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这三种模式。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难的。现在回过头看1949年以前，20、30年代中国社会里面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有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那么多优秀人物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知识精英主要的活动，依赖这三种制度，没有这三种制度的成功，很难想象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能够维持那么好，也很难解释1949年以前，中国教育和文化所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西方文化制度的时候，有两点把握的比较好。中国1905年后，西方新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科举制度。选择新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它的大学制度的时候，特别是选择这种制度的初期，如果比较僵化、比较保守，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制度的选择就会偏差，所幸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中，遇到了恰当的人。

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是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人，基本是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比如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严修等，他们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比如说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的时候，初期负责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他们有职有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能够把握得准。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来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大学开始设立大学

部，1928年正式叫国立清华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是现代的大学，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大约有这么几点：第一是综合大学；第二是男女同校；第三有严格的课系制度，就是院系制度；第四有比较完善的选课制度；第五有定期的学术著作和定期的学术期刊出版；第六有比较普遍的体育活动。这是基本的硬件。另外还要包括这么几条：学生和教授的自治程度比较高，教授治校和学生社团比较发达，政党活动不能在大学里开展。

现代大学11世纪起源，13世纪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基本上由教会演变过来。大学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它的自治程度要高，这就是大学独立的意义。西南联大出现的背景，大体就依赖前述那三种文化制度。

成为一流大学的人文条件

西南联大为什么成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这个前提以外，昆明自然环境比较好，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不大关注西南联大所在的自然环境，我们比较关注人文条件。当时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出生和教育上来判断是三种类型，这种三种类型分成教授和学生两个群体。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像胡适这一代，还有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这部分人，出生年龄在1890年前后。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基本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年龄在50岁左右。第二类教授群体，就是1900年前后到1910年，就是费孝通、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人。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言之，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上弱化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如钱钟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联大当时有一个统计，在179个教授中，留过美国的有80多个，留过英国有30多个，留过日本的比较少，有3、4个，没有留学的很

少。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博士，梅贻琦是留美硕士，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但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是博士。在西南联大，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西南联大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

第三类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不过传统教育对2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也不好和前代相比了。但2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后来杨振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邹谠、殷海光在政治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获得很高地位，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化基础分不开。西南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如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因为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所以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1949年以前，不是一个空的观念，而是真的落在了实处。知识分子以传统教养和西方价值融合起来做事，来判断人。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大，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那段岁月，已成绝响

刘宜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尽管它在昆明只存在了8年的时间，却与百年中国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8年的时光，西南联大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立地顶天，它分出的枝桠分别是思想自由、民主堡垒、通才教育、教授治校……每一枝都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笳吹弦诵在春城”，一代学子士人的往事已烟消云散。让我们踏上西南联大的来时路，追寻它的精神故址，探索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教育之根。

西南联大，生于忧患

1937年7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和几个朋友在北平香山饭店吃饭，下午回到清华园，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西直门关了，不知出了什么事。第二天，冯友兰才得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卢沟桥开火了。

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建国复兴的教育大计，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南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以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教育部次长周炳琳、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北大教授傅斯年、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张、蒋、梅为常委，杨为秘书主任，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清华、南开为班底，接收三校流亡学生。